

聯合文學

經歷了二十年，台灣已臻至族群關係融合和解的境界嗎？

本書以歷史、語言、文化與政治為線索，

討論台灣原住民近代以來法政主體的變遷與發展，

反映了台灣當前政治中的文化、族群與認同問題，

並提醒後代持續為夾縫中之族群的存在與發展共同努力。

夾縫中的族群建構

台灣原住民的語言、文化與政治

孫大川 著

夾縫中的族群建構 台灣原住民的語言、文化與政治

作者／孫大川

發行人／張寶琴

總編輯／王聰威

叢書副總編輯／杜晴惠

文學叢書主編／鄭順聰

執行編輯／李香儀

資深美編／戴榮芝

校對／孫大川 李香儀

法律顧問／理律法律事務所

陳長文律師、蔣大中律師

出版者／聯合文學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110)臺北市基隆路一段180號10樓

電話／(02)27666759轉5107

傳真／(02)27491208 (編輯部)、27567914 (業務部)

郵撥帳號／17623526 聯合文學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6109號

網址／<http://unitas.udngroup.com.tw>

E-mail:unitas@udngroup.com

印刷廠／瑞豐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銷／聯合發行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231)臺北縣新店市寶橋路235巷6弄6號2樓

電話／(02)2917-8022

版權所有・翻版必究

出版日期／2000年 4月 初版

2003年12月25日 初版二刷

2010年 1月 二版

定價／240元

copyright © 2000 by Sun Ta-chuan

Published by Unitas Publishing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Printed in Taiwan

夾縫中的族群建構

——台灣原住民的
語言、文化與政治

● 孫大川／著

目次

【再版序】原住民與台灣的文化政治／孫大川……………005

【初版序】大力入世，微醺守虛／孫大川……………007

有關原住民母語問題之若干思考……………009

台灣原住民的困境與展望……………022

語言、權力和主體性的建構……………036

文化多元性與原住民生活輔導間的困擾……………050

部落的組織與溝通……………060

從言說的歷史到書寫的歷史……………082

行政空間與族群認同……………099

夾縫中的族群建構……………126

從言說到書寫……………161

探訪原住民的心靈世界……………179

體檢小學教科書中的族群觀……………188

對台灣原住民教育的一些思考……………195

部落工藝的經濟轉化……………202

【再版序】

原住民與台灣的文化政治

孫士奇

這些年來許多年輕朋友常問我到哪裡可以買到《夾縫中的族群建構：台灣原住民的語言、文化與政治》這本書，如今我終於可以明白回答了。

一九九〇年代起，是台灣原住民民法政建構最蓬勃發展的年代。從修憲、入憲、原民會成立、原住民族教育法的訂定，到二〇〇〇年的新夥伴關係、準國與國關係和原住民基本法的通過等等，原住民法政議題的突破，無論在面向或速度上，皆給人瞬息萬變、目不暇給的感觸。這當然是台灣社會多元化、民主化的勝利。雖然還是有些人迷信台灣未來發展的關鍵依舊是在經濟的成長率，但愈來愈多的跡象顯示：台灣接下來的問題是文化的問題，是社會與人的品質提升的問

題。

就在這樣的文化政治脈絡下，做為極少數的台灣原住民族，便具備了扮演某種指標性意義的角色。她們不但可以測試台灣人權的高度，也可以做為衡量台灣文化多元性的標準，更可以視為本土化運動的最後堡壘。本書以歷史、語言、文化與政治為線索，討論台灣原住民近代以來法政主體的變遷與發展，反映了台灣當前政治中的文化、族群與認同問題。或許就因於這樣的緣故，使我們相信仍有再版本書的價值，一方面藉此勾勒台灣原住民法政發展的軌跡，另一方面也突顯台灣政治現實的文化本質。

本書討論的時間斷至二〇〇〇年，這之後政黨輪替，民進黨政府對原住民符碼的運用更見靈活，基本法的通過和自治區的推動，即是顯例。不過，落到實際面來檢驗，八年的執政，成效並不如預期。關鍵還是在我們對台灣文化的大戰略缺乏定見與決心，經濟和兩岸的議題很快淹沒了我們對文化培育的耐心與信心。其實，除了更民主、更多元之外，台灣並沒有什麼更大的競爭力值得傲視他人。八八風災之後，我重返政壇，這個文化政治的議題，也成了我日常生活中念茲在茲的問題，不單拿它來檢驗我的工作，也拿它來檢驗我自己。

二〇一〇年元月十一日

大力入世，微醺守虛

〔初版序〕

其實我從來沒有想到自己會從政，但也毫不懷疑自己介入的決心。人生每一個階段都可能有不同的際遇和召喚，積極地「響應」它，有時也會形成某種敞開性，讓我們能和自己所處的人生「場合」對話，並做出當下的抉擇。這是一種成長，也是一種冒險。

如果我們將民國七十年代視為台灣原住民主體性意識覺醒的年代，毫無疑問的，民國八十年代開始，原住民族社會動力的方向已逐漸轉移到法治訂定及行政層級提升等結構性問題的處理上。歷次憲法增修條文，不僅予原住民族在憲法上有明確的定位，並正面回應「原住民」正名的訴

孫大

11

求。更重要的是：憲法肯定多元文化的價值，明白表示政府應依「民族的意願」，推動原住民各項建設。民國八十五年底，行政院成立原住民委員會，中央層級、負責統籌規劃原住民事務的專責機構終於誕生，這是中華民國民族行政史上最重要的里程碑。憲法的突破和行政空間的拓展，不再是口號或一廂情願的訴求，而是新世紀台灣原住民必須加以珍惜的現實。

在這十年中間，我曾走遍各大學山地服務隊，想推動一個比較以原住民為主體的山服觀。民國八十二年創立《山海文化》雙月刊，結合許多原住民或愛護原住民的漢人朋友，共同搭建一個創作和書寫的舞台。民國八十五年，因偶然的機緣到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服務，成為政治世界的見習生。在這些不同階段裡，無論我擔任什麼工作或身處什麼地位，都覺得其實我仍只是單純地在答覆自己對原住民黃昏處境的焦慮。一種不甘心，驅策自己不容自己的「大力入世」；而十年下來，自己性格深處「微醺守虛」的成分竟比原來的估計來得多。而後的十年呢？或許應該要做一些調整吧！

這本書記錄了從一九八八年到一九九九年，我對原住民文化、社會和政治的觀察和期待，算是告別二十世紀的紀念。同時，我也願意將它獻給我山服隊的學生、山海的夥伴以及那些可敬的政治家們。

有關原住民母語問題之若干思考

一

語言文字載有一個民族的記憶和圖像，乃一民族歷史、文化生命之所繫，更是民族認同的基礎；它不但是我們區別不同種族時之重要標誌，同時也是人類文明寶貴的財富。從某種角度說，對一個民族語言文字的尊重與保存，乃是民族平等最起碼的要求；語言文字的平等，在一定意義上說，也顯示了政治、經濟和文化上的不平等。

原住民各族母語長久以來所受到的不平等待遇，充分地反映了原住民九族同胞悲慘的處境。語言的迅速喪失，正是造成原住民黃昏性格的主因。

在這篇短文中，我們希望透過對原住民母語問題的思考，明白指出四十年來不平等的語言政策，對原住民社會、文化、心理與生存之摧殘和威脅，並進而凸顯當今推展原住民母語教育的重要性、急迫性和其意義。若可能的話，我們也願意站在現實的基礎上，對推展原住民母語教育之若干實際問題，提出一些反省和建議。我們期待一個能超越政治魔術、腳踏實地的真實相遇；對我而言，原住民的問題，已緊迫到不容許我們做任何浪漫的討論和廉價的承諾。

二

嚴格地說，台灣原住民母語之迅速喪失，乃是近四十年來的事。日據時代原住民的社會、文化，固然也有若干深刻的變化，然而一般說來，當時許多部落的社會結構和風俗習慣等並未遭到徹底的摧毀。直到一九四九年以後，情況才以制度化的方式全盤惡化。這當然和國民黨政府的原住民政策有關。而值得留意的是：國民黨原住民政策的制定和執行，一方面和該黨當時之歷史處境及其所衍生之統治性格有關，另一方面也有它隱藏的文化因素。

不同於日據時代，國民黨政府的原住民政策採取的是一個比較積極的輔導（干預？）手段。從民國四十二年，台灣省政府頒布「促進山地行政建設計畫大綱」起，歷年來頒訂的原住民政策和方案，內容雖有增修，但始終不離「山地平地化」的總方向。其中規定的條款，主要還是僅在經濟生活的改善、社會改革、政治納編的目標上。尤其嚴重的是：和文化發展有關的教育政策，其目的不在幫助原住民認識、整理自己的文化，反而是教導他們脫離自己的傳統，學習迅速地融

入所謂的平地社會。這是典型的「同化」(assimilation) ①。

當然，作為一個在各方面皆處於劣勢的少數族群來說，我們充分了解「保護」與「發展」在現代化的歷程裡始終是一個弔詭的兩難僵局。但是，它終究不能拿來作為民族「同化」的藉口。因為，任何人為的同化，不論其目的是如何的正當，皆違背了人道、人權以及民族平等的原則。

本來在一九四九年以前，原住民的社會與文化雖仍保留若干傳統與生機，但其實早已飽受至少來自兩個方面的威脅：一是四百年來以閩、客為主不斷湧入的漢族勢力及其優勢文化的壓迫；一是由日本殖民地政府推動的全島性資本主義現代化的要求。這兩方面的威脅，其實早已使原住民陷入和廣泛第三世界之弱小民族相同的命運和困境。就這一點說，我們不難發現國民黨遷台後所推行的原住民政策，其最大的罪惡，即在臨門一腳，以「人為」的手段加速了台灣原住民的社會、文化之崩解，使他們失去了一個緩衝以及自我調整的機會。「山地平地化」的政策，對原住民而言，實乃藉山地社會、經濟現代化之名，行民族同化之實。失去了自己的文化，喪失了民族認同的線索，原住民還有存在的可能嗎？

那麼，到底是什麼因素使國民黨政府的原住民政策忽略了文化的幅度呢？是什麼因素使他們由民族「融合」(integration) 偏離到民族同化的歧路上？

我們認為這首先和一九四九年前後國民黨的歷史處境及其所衍生的統治性格有關。對國民黨政府而言，一九四九年在大陸的徹底失敗，以及它當時在國際上所能捕捉的狹窄且瞬息萬變的政治空間，使它在心態上始終充滿危機意識。走鋼索以及不安全的焦慮，因而纏繞在國民黨那一整代人之靈魂深處，成了它四十年來在台灣統治的本質。

由這個本質出發，國民黨許多政策與行政作為，自然便以國家安全、政權穩定為其考量的標準。這原是可以理解的，也有它一定的合理性。不過，一旦這種安全考量漫無限制地擴張開來時，它就變成了排除異己、專斷獨裁、非理性、反民主勢力的溫床。「安全」壓制了獨立思考的自由，限制了想像、創造的空間。教育、言論自由甚至司法，在安全之網的過濾下，變得蒼白、扭曲、毫無活力。這種情況，至少在民國六十年代中期以前，無疑是台灣社會與政治品質的如實寫照。

安全考量在文化上最惡劣的反映，即是將文化變成政治的附庸。在泛政治的氣氛籠罩下，「本土性」的文化符號與活動成了某種敏感的禁忌。如果大家回憶一下民國六十年代中期以前，台灣在文學、影劇、音樂等各方面的表現形式，不難發現當時這一類文化性活動，幾乎毫無本土的色彩。而這種離土的文化生命之荒謬性，非常露骨地反映在國民黨長久以來的語言政策上。

民國四十年代前後，「推行國語運動」便如火如茶地展開，從政策到執行，我們都可以明顯地感受到它背後的政治意圖。這個語言運動，不但影響方言（閩、客）、本土文藝的發展，對原住民各族母語的存續，更造成了致命的打擊。如眾所周知，原住民九族大都只有語言而沒有文字，民族記憶和經驗僅能靠口耳相傳和若干社會風俗習慣來維繫。社會風俗習慣在「山地平地化」政策的「開導」下，在民國五十年代便已幾乎蕩然無存。而當時唯一還可以延續民族文化生命的母語，竟也在雷厲風行的「國語運動」中，遭到空前的破壞，其嚴重性遠非閩、客方言受害的情況所可比擬。閩、客語固不同於北京官話，但無論從語言系統或書寫系統看，它們到底是相同的語言符號，分享著共同的文化生命。而原住民，在失去了自己的語言之後，便如斷了線的風箏，飄

浮在二十世紀末的黃昏經驗裡。

除了上述的政治和歷史格局的因素外，我也常懷疑「山地平地化」和「推行國語運動」政策的形成，有它隱藏的文化因素在。在中國這一大片的時空領域裡，一直有這樣一個牢不可破的文化傳統：漢族瞧不起其他異族、中央瞧不起地方。這不只存在於國民黨外省人靈魂深處，也同樣活躍在台灣閩、客人的思想腦袋裡。這正是許多國民黨外省人到台灣四十年不會說閩、客語，閩、客人到台灣四百年不會說原住民語；外省人不自覺地壓迫本省人，本省人不自覺地壓迫原住民的千古祕密。對一個原住民而言，在檢討、批判國民黨政府的民族政策的同時，我們不能不警惕於這樣的文化因素。我們深信，除非我們能徹底瓦解那潛伏的種族中心主義，否則民族平等的理想永遠是鏡花水月。當然，這已不只是政治的問題，它關涉到更廣泛的文化批判工作了。

三

「山地平地化」和「推行國語運動」，分別從社會和語言的層面斬斷了原住民的民族文化生機：它造成的破壞性，絕不是生活的改善所能彌補的。一個失去其所「是」(is)的民族，再多的擁「有」(have)，也無法填補她的失落。這正是當前原住民的黃昏處境。它的影響滲透到原住民全民族、全人格的整個存在領域。我們不妨將這種情況，視為原住民符號世界的喪失。

在古希臘文中，「logos」這個詞兼具「言語」(oratio)及「理性」(ratio)雙重含義。海德格(M. Heidegger)因而認為應將亞里斯多德(Aristotle)對人的傳統定義：「人是理性的動物」，改

譯做：「人是會言語的動物」^②。根據海德格的分析，「言說」(rede)不同於「語言」(sprache)：前者是「此有」(dasein)的存在性徵，亦即此有向自己「開顯自己」及世界的固有方式；而後者則是「言說之對外說出」，乃針對別人而表達的「語言」^③。將「語言」植基於「言說」，並指出它與存有的關聯，乃是海德格對語言的特殊理解和貢獻。他讓我們看出來，語言不僅僅是一種表達的「工具」，它實是存有自我顯示之所，乃「存有之屋」。卡西勒(E. Cassirer)亦從另一個文化哲學的角度，證實了海德格的看法，他定義人爲「「符號的動物」」^④。

原住民符號世界的解體，從存在的角度說，即其「存有之屋」的喪失，是其呈現民族「本質」(essence)、表現民族「形式」(form)的喪失。這種失落，不但逼使整個原住民走向死亡的命運，而且深遠地影響到原住民每一個「個體」的全幅人格世界，成爲他們適應或回應現實生活不良的總源頭。

語言符號的喪失，首先使原住民原來單薄的社會力、文化力迅速完結，他們全然失去了他們的傳統。對原住民文化傳統的誤解與陌生，其實並不完全只存在於平地社會，即在原住民本身，尤其新生的一代，那種模糊性和陌生感同樣的普遍。對許多原住民朋友來講，母文化、母語，已經不算是天生、自然的存在，它反而需要重新釐清、重新學習；那麼，到底是什麼或哪一個才是他的母體呢？認同上的分裂情緒，定然深深地困惑著每一個原住民的心靈，消耗其精力，影響其回應外在挑戰的靈活性和專注力。

對一個民族來講，「傳統」(tradition)並不完全是一個靜態的、一成不變的歷史的過去。人的「現在」，是一個不斷受「過去」的影響、塑造、啓發，並不斷被「未來」的理想、期待和想像

所滲透的「現在」。從某種角度說，「傳統」是一個民族創造力不可或缺的元素；憑空的創造不但不可，也無法讓人理解。卡西勒曾引述塞恩柏（Gottfried Semper）的話說：

語言的「根」始終是能夠確保其有效性的，在這些根的基礎上產生了一些後續的概念上的變形與拓展過程的情況中，這些根之基本形式是會一再重現的。如果我們爲了要表達一新的概念便立刻求創造出一全新的字的話，則這種創造便將連要使其自身可以被別人了解這一首要的目的也不能達到。基於同樣的理由，在藝術的領域中，我們亦不可以隨便把藝術符號的一些最古老的模型與根廢除與棄置不顧……在比較語言學和有關語言原始關係之研究裡，語言學家們顯然是可以享用上述的一種有利條件。而在建築學裡，一建築藝術家同樣地是可以享用這一種有利條件的，他可藉以認識他所用的建築學的語言中種種最古老的符號象徵的原初意義，並藉此去解釋他自己正在以怎樣的一種方式就形式上和意義上隨著這一藝術本身作出一歷史向度之變遷。^⑤

這爲創造所依附的「根」或傳統，對原住民來說，顯然是不存在或至少是極端模糊且正以加速度的驚人方式迅速消散中。除非我們能盡快建立一個砥柱點，延緩其奔流潰散的速度，原住民文化的死亡則將是立即的事。爲原住民而言，「延緩」所爭取的，無論是多麼的短暫，都可以給他們一個喘息的機會，設法肯定自己的傳統；讓他們的創造力有一個起碼的著力點，創造出多多少少能具有民族的根、民族的色彩、民族的聲音的作品，並在這基礎上形成一個「新」的傳統、新的可能性。